

所谓“全”，则是在总原则指导下，凡是符合收录原则之文献资料均不遗余力予以收录。以宋江通《冲虚至德真经解》为例，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为二十卷，与明正统《道藏》本所收卷数相同。而《四库全书》所收为八卷本，且四库馆臣认为焦竑所记有误。遍查文献记录，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刊四卷本《冲虚至德真经解》，将其与《四库全书》本对校，可知此四卷本为残卷。且《四库全书》所收之八卷本文字多有残缺之处，馆臣均予以标注。取四库本相关篇章与此四卷本相校，凡四库本字缺失之处，此本均不缺。据此而言，此四卷残本之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所谓“精”，则是在“全”之基础上甄别好坏，选择最佳之刻本。如张湛《列子注》，自敦煌写本以下多达数十种，最早刻本为黄丕烈所购得之北宋刻本。而自陈景元整理唐人殷敬顺《列子释文》之后，便有人将《释文》混入张湛《列子注》中，由此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传本系统，现存最早之刻本为南宋刻本，这也是今存《列子》传本中最早的《释文》与张湛注的混排本，此后这一系统的《列子》传本均渊源于此。以后元、明、清各朝均有刻印，且其流传之广超过未混入《释文》之张湛注本。《列子卷》所收三种张湛注本，除北宋本外，还有《湖海楼丛书》本与铁华馆摹宋本。陈春《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校勘，以世德堂本《列子》为底本，校对北宋本《列子》，剔除殷敬顺《释文》，且对原文亦有校勘，诚为上善之本。而蒋凤藻所摹刻之宋本《列子》，虽为原书之摹刻本，但斯所刻之精美，与宋本相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列子》传本中不可多得之善本。此外，《列子卷》还收录了诸多名人批校本，如周星诒、黄丕烈、顾广圻、管礼耕、江德量、陆云士、章钰、翁廉、方惟一、蔡元培等人批校之《列子》。尤为可贵者，《列子卷》收得罗复堪过录梁启超批点本《列子》，直观反应了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其文献价值相当高。

《子藏·道家部·列子卷》集中了现在所能发现的所有《列子》与《列子》相关的文献资料，成为专家学者研究《列子》的资料宝库。相信这部丛书的编纂出版，一定会给学界研究《列子》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方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和事工史的新探索

——评《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

邓 杰

西方基督教一直在不断努力探寻着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最恰当的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基督教传播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文字的传播了。通过发放出版物，基督教不但布道了基督信仰，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对我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和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陈建明教授新著《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①以近代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华西地区的文字事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的发掘爬梳，使中国基督教会这一事工得以呈现。就传教区域而论，正如陈著所言，华西地区乃为传教意义上的相对空间区域，最初仅指四川。随着传教区域的进一步扩展，华西教区逐渐包括云贵川三省。而就出版物的发行范围而论，华西教区甚而还包括有藏、甘、陕部分区域。区域的划分，为该著论证的周延性起到了很好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布道与教育事工做了大量研究，但对文字事工研究涉及较少。《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着重于该学术领域的知识拓荒。该著不但梳理了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传播路径，而且展现了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文字事工。该著通过考察基督教在华西地区开展文字事工的目的、兴起和发展、出版机构的建立与运作、出版物的内容和发行模式，从而对该地区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问题、特点和社会影响作出分析和评价。

^①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13年。

鄙意以为陈著的灵魂在于“求真求实”，全面、系统、厚重、翔实，而非应时应景的轻浮之作可相提并论。该著所涉基督教期刊40余种，详细介绍的期刊就有20种之多；详细介绍的基督教图书发行机构也有10余个，足见作者爬梳资料的详实度。该著的出版，不但明晰了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文字事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领域研究薄弱乃至空缺的现状。尤为难能的是，陈著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在华西的出版机构、期刊发行状况，贯通了晚清（1868—1911）、民国前期（1912—1937）、民国后期（1937—1949），其跨越几个时代的“代际研究”模式较之某一特定时段的研究，更凸显了基督教文字事工在不同时代语境中传播的辗转与变通。

从学术史的角度上看，该著是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文字事业研究最扎实的作品。以往对在华基督教传教史文字事工的研究比较偏向于做宏观的类似“共案”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能够提供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整体认知，这是它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这样的研究因涉及的历史事实太多，题中应有之义过于丰厚，难以充分发掘，因而往往离探清史实的原貌仍有相当距离，很多具体的史实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而唯有厘清历史的迷雾，方才有可能对中国基督教的处境与问题作高远深思。

在该著中，作者注重基督教文字事工与同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发展、基督教的本色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共建政及国际两大阵营冷战等历史事件的连接互动，为解读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提供了宏大的阐释域。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政教交锋频仍，文字事工在夹缝中得以创立并艰难生存至今，既记述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客观上也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桥梁和纽带作用。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文字事工并非基督教所涉复杂关系中的主要构件，但华西文字事工的发展、运作及衰退之全过程，则为观察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提供了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剖面。

从学术理念上讲，该著是“中国中心观”所驱动的区域史研究的集中体现。美国学者柯文以为，史家研究中国史必须要有“中国史境”，应力图设身处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但奇怪的是，柯文发现，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近代史学者一方面赞赏“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始终不能脱离西方理论的解释体系。^①这是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方式上的缺憾。罗志田认为，这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任何重大事件都少不了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史学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制约甚大。^②陈著着眼于中国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的娓娓叙述，特别是该著在第三章中将基督教华西文字事工置于抗战的紧张时局中，详实阐释了西南地区的基督教文字事业在抗战期间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局面，最终从具体史实中得出结论：华西地区文字事工在此期间呈现出了繁荣景象，随着战后中国政局的东移而随之走向衰落。这些论述将基督教、区域文化与国家命运密切结合，让读者看到了不同寻常、富有意义的内容。此外，受“中国中心观”的影响，陈著也特别着重考察那些中国人的文字出版活动。这与以往较多以西人为对象的研究作品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基督教文字事工与政府、时局的关系，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心。但是，无论是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传播还是基督教文字事工在该地区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基督教与政府和时局的关系，因而基督教文字事工在华西地区发展的每一步骤都深深烙上了时局的印痕。从1868年4月英国圣书公会的亚烈伟力和英国伦敦会的杨格非在四川旅行布道售书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维持了80余年。在此期间，政局动荡、人浮于事。正如作者所言，相较于全国，华西基督教文字事业只是全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较之于华西基督教诸多事工，文字事业也只是其中一项；对于中国整个出版史来讲，其所占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但华西文字事工的兴衰历程无不时局变迁、教会变革息息相关，因而华西基督教文字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所难免：物资条件较差，经费严重不足一直是困扰华西文字事工的首要问题；华西各差会之间缺乏紧密配合以及投稿作者的素养不够是华西文字事工的又一重大难题；读者定位的不准确，致使刊物普遍缺乏吸引力；加之时局动荡，读者购买力普遍弱小，书刊销量不大等等，则在情理之中。^③

对篇章结构独具匠心的安排是该著的一大亮点。该著以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组编结构。上编三个章节，按历史分期分别论述了文字事工在晚清的开拓，民国前期的稳步发展及民国后期的短暂繁荣与衰落情形。下编三章则按专题讨论文字机构面临的若干共同问题：第四章讨论具有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字事工，第五章讨论文字

①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③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第532—545页。

事工的计划、经营与管理,第六章分析了华西文字事工的问题、特点和社会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虽然在华西创办的期刊和出版机构在数量上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比,但是仍有值得重视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华西地区文字机构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二是在抗战时期,全国重要的基督教文字机构均集中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华西地区,对教会在抗战期间在该地区的发展乃至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华西基督教文字机构长期坚持出版活动,各类出版物遍布城乡,甚而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对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播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①

尤为值得关注的则是该著对基督教华西文字事工的特点和社会影响的揭示。诚如书中所言,“致力文字事工的本色化、以成都为文字事工的中心、关注少数民族文字事业”是华西文字事工的三大特点。基督教本色化表现多样,其中之一乃为宣教方式的本土性。陈著以为,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本色化的表现主要为三:文字机构由中国人担负主要责任;一批华人作者使用本土语言写作,或将外语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部分作品内容贴近中国人实际需要。^② 杨天宏教授曾言:

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在发展路径上经历了三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在神学理路上由倾向基本教义的“个人福音”向被认为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社会福音”的转变;二是为体现基督教的“普世性”并因应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从“原生”状态向实现在异国它乡的“本土化”或“本色化”的转变;三是从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转向内地甚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寻求发展的转变。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而言,这是三个重要的变化。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几乎所有活动,都与这三个变化有关,是其内在意蕴的外化。^③ 基督教华西文字事工的本色化,则是很好地反应上述基督教后两个变化的重要事件。虽然陈著也指出,因“大多数机构的经费和书稿来源仍然有赖于国外差会”,“华西真正有规模的新教出版机构仍然处于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和管理之下”,其文字事工完全做到自养实属不易,^④ 但综合当时的社会及时局因素,能做到如此程度已难能可贵。

其中,可资圈点的应属创制少数民族文字这一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鲜明特色”。为更好地宣教,传教士在创制少数民族文字方面可谓大费思量。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配合下,传教士成功研制了诸如柏格理苗字、东傈僂文、西傈僂文、景颇文、佤文、拉祜文、彝文等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⑤ 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远超出了仅为扩大信徒数量的初衷,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进步的贡献可以想见。

至于“华西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社会影响”,陈著归纳有五:推动华西乃至全国基督教的发展;促进华西现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兴起;提高民众识字能力,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推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进步;维护民族独立,鼓吹民主政治。^⑥ 其中,最引人产生兴趣的乃为第二点。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字事工在中国的兴起,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中国虽为印刷业的发明始祖,但正如陈著所论,从宋代到清朝,华西的印刷业一直以官刻、家刻(私人出资刊刻书籍)、坊刻(书商经营的书坊、书肆)的面貌出现。中国传统木版印刷质量不佳、批量小、费时长等不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了印刷业的长足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学东渐”风气的沐浴,西方近代印刷术从沿海逐渐传入西南边陲,出现了新型的翻译、印刷、出版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新教传教士的作用功不可没。陈著详尽叙述了基督教差会在四川如何建立印刷厂以及如何使用先进印刷技术的历程,为四川印刷史的厘清可谓功劳有加。这应是陈著对学界的额外贡献吧!

对于基督教在华西文字事工作用的评析,则是该著的又一亮点。该著以为,对于基督教华西文字事工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或散布麻醉中国人民思想的鸦片”。陈著借用了隗瀛涛和王笛两位教授在《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一文中的看法,即“西方传教士在实行宗教殖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沟通中西交往方面充当了积极的角色。毫无疑问,西方宗教及其事业作为侵略工具进入长江上游地区始终受到人们心理和社会的排斥,但它们却又以其特有的韧力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而成为其社会近代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⑦

①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第580—581页。

② 同上,第550—559页。

③ 杨天宏:《基督教边疆服务研究的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第552页。

⑤ 同上,第559—561页。

⑥ 同上,第561—580页。

⑦ 隗瀛涛、王笛:《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1页。参见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第584页。

瑕不掩玉，鄙意以为该著似仍有进一步提升质量的余地。陈著虽有所涉及基督教期刊发行机构但并未系统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除此之外，作者虽已触及并披露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但亦点到为止，未曾深入发掘内涵。当然，西南地区因文化上的滞后、资料与档案保存上的问题，比如说抗战时期的混乱局面、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字史料的散佚难寻等，造成了研究的困难。这些虽然是该项研究的难题所在，但也可能正是该著值得深入拓展之处。

(作者邓杰，1973年生，四川文理学院教务处历史学教授，博士。)

传播理论的伊斯兰范式及其建构^{*}

——哈密德·莫拉纳《转型中的国际传播：多样性的终结?》评析

赵绮娣

传播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数十年来一直以西欧与北美媒介语境为导向，西方传播理论也成为普世主义的一个强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然而，复杂多元的人类传播充满了差异，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实证主义为主流的西方传播理论缺乏对其他文化价值、信仰体系与传播模式的理解，“多数理论往往无法进入解释的深处，当把这些传播理论搬离西方的学术语境时，其术语、理论与概念都缺乏实用性”。^①作为对传播理论西方话语霸权的回应，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美利坚大学教授哈密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②在《转型中的国际传播：多样性的终结?》(*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Diversity?*)一书中，以历史与整合的取径，跨越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系统的研究与调查，在传播和国际事务关系的脉络中提出了“伊斯兰的传播范式”。该书由SAGE出版社于1996年首次出版，作者的概括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价值相适应，不仅展现了一种认识现实的内在视野，同时也因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重新定位而引起相当的关注与影响。遗憾的是，国内至今尚未有汉译本出现。本文仅拟从书中“伊斯兰传播范式”的提出及其概念、伦理、原则等作一评析与读者分享。

首先，在国际传播研究路径与媒介技术演变的双重交织线索中，关注“伊斯兰社会”案例，寻求非西方的大众发展。《转型中的国际传播》一书由莫拉纳发表于1990年代的多篇精华之作结集而成，全书分为九个章节，在多学科框架的宏观视野下，一方面系统检视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媒介技术发展的过程，勾勒出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的生态维度；另一方面，特别将“伊斯兰社会”置于案例研究的中心地位，为读者从传播—权力、宗教—政治、地方—全球的多维视角展现了世界传播的历史与前沿，力图在理论与实践、潜力与现实之间搭建桥梁。

在书中引言部分，莫拉纳即开宗明义地阐明：“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诸如中东和北非，现代传播技术与研究不像在美国和欧洲那样，植根于他们的传统当中；在这些地区研究传播问题的趋势是：采取与人类和一些特殊领域相关的历史分析，如文学、诗歌、哲学、神秘主义和宗教”。特别是在传播与社会的结构化脉络中，作者引用一些学者针对“前工业地区”的传播与政治研究结论，认为“非西方社会(亚洲、非洲、中东)的传播模式与渠道——即口语传播、面对面传播，比仅仅提供信息发挥着更广泛的功能，同时也定义了更广泛的社会关

*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城市民族旅游社区地方性保持：多元认同的建构主义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41271157)。

① Ronal D. Gordon, 2008: 317; 转引自 Dongxiao Li,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5 (3), 2009, Book Review on Asiat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P98.

② 哈密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美国西北大学博士，美利坚大学国际传播教授，前国际传媒研究协会(IAMCR)主席，参与数种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多次获杰出学术奖。